

第一章

我的家乡



## 我心中的凤阳

说到凤阳，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因为那里出生过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明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即通常说的二十四史中占了 276 年。唐、宋、元、明、清 明朝是这五大朝代中重要的一段。

凤阳县地处黄淮平原中部，我国第四大河流——淮河的南岸，东边靠石门山、花园湖，内有凤阳山水库，津浦铁路、淮南铁路从它的腹地通过，加上它紧靠着的蚌埠市有民用航空飞机直飞首都北京，可以说是个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的好地方。1948 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铁蹄下解放了这个地方，受苦受难的凤阳人民翻身做了主人。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地方政府领导着人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得十年九荒的穷凤阳，变成了国家产粮基地。如今的凤阳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更是跃马扬鞭，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发展。

我出生在凤阳，我爱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离开凤阳的四十多年中，不管是在南在北，在东在西，也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的环境中，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1986

年 5 月，我在安徽省省会合肥举办书法展时写过这样的对联：

为国巡天数十载      情系凤阳小韩庄

这是我的心里话。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员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者，如果连国都不爱，哪里还有什么国际主义好讲呢？爱国和爱家，爱生我养我的地方是一致的。如果连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都不爱，还谈得上什么爱国呢！

我记得老人们说过这样的话：“走千走万 赶不上淮河两岸 又有大米，又有白面。”这句话今天变为现实了，然而，解放前的凤阳在我心中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这我要从头说起。那时的凤阳没有汽车，但铁路、水上航运交通都比较便利，应当算得上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五谷杂粮 稻、粱、菽、麦、黍、稷都能种 都能收 比什么地方都好。但那里又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地，      小户人家卖儿郎，  
老汉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溜四方。

就是这身背花鼓，拖儿带女，四处逃荒要饭的凤阳人，成了凤阳的代名词，这首歌出了名，凤阳穷也出了名。只要说到凤阳花鼓，年纪大一点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是凤阳人不爱自己的家乡吗？不是的。是像有人说的凤阳人爱要饭，有要饭的习惯吗？更不是的。那是没有办法啊！为了生存，出于无奈，老一辈的凤阳人才背井离乡，拖儿带女，走上沿街乞讨的路。

我出生在凤阳县的“大溪河 西北乡 五里路 韩家庄”。这句话是日寇侵略中国那年，鬼子快要打到我的家乡时，为了怕跑反时跑丢了，我母亲一字一句教给我的。

那是 1937 年的冬天，我刚记事不久，只有四五岁。我父亲参加红

枪会打鬼子去了，家里只有我母亲，我姐姐，还有一个才会走路的妹妹。当时乡亲们听说鬼子要打来了，又杀人又放火，谁还敢在家里呆着呢？我们庄子上的人都要跑，老人们哭，孩子们叫。青壮年都到打鬼子的前线去了，剩下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办好。又听说鬼子从南边来，人们都拥拥挤挤地向北边跑。我妈妈挑着两只筐，一头是粮食，一头是我妹妹，她叫我姐姐拉着我，没命地向北边跑，又怕我和姐姐跑丢了，不时回过头来喊我姐姐和我。大冷的天，我妈妈是又累又紧张，累得满脸是汗水，慌得两眼含着泪花，可真难为了我可怜的妈妈。向哪跑又没有个准的目标，先跑到了小溪沟，天都过中午啦，又累又饿，大家都停下来，忙着做饭吃，饭还没有做好，又听说鬼子向这边打来了，这一下子更乱了营，什么也顾不上啦，一窝蜂似的向黄家湾跑。不知在什么时候，人群跑散了，旷野里只听得人们哭天叫地，乱成一锅粥。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和姐姐跑到哪儿去啦，反正循着声音跑吧，跑到黄家湾，天都黑啦，大人找孩子，孩子找大人，乱了营啦。这时我妈妈教我的我家在“大溪河西北乡五里路韩家庄”真用上了。人家看我这个只有四五岁的孩子，哭着找妈妈，喊姐姐的，就问我是哪里的？我照着妈妈给我讲的说了，人又问我姓什么？你父亲是谁？我说我姓韩，我父亲叫韩万祥，人家知道了，正好我外公一家子，也跑反跑到黄家湾，他们把我领到我外公那里，在那里见到了我妈妈和我姐姐我妹妹，一家子又汇到一起。我妈妈和我姐姐抱着我大哭了一场，后来我外奶奶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劝，才止住了哭泣……

我们在黄家湾没有住多少天，可能有个把月，回家打粮的人回来，没有事，鬼子没有进我们韩庄。这时我父亲也来了，大家见面，说起跑反跑散了的事又是大哭一场。吃过早饭，我父亲挑着担子，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了老家。

那时的大溪河仍是乡公所，驻了一小队日本鬼子，乡丁变成了二鬼子，离我家有十多里的小溪河，是区公所所在地，也驻着一队鬼子，加起来不到一百人。二鬼子加起来有百十多人。他们勾结起来欺压人民，今天为鬼子修路，明天为鬼子修炮楼，挖壕沟，今天要这个捐，明天要那个税，弄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人们只好又向外

跑。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日本鬼子占领凤阳的第二年春天，我们韩家庄上的人除了一家以外几乎都逃荒出去了，我家只留了我姐姐在家。我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我妹妹，一头是破被子，我妈妈拉着我跟着我父亲走。第一站是到定远县 我们那里有这样的话：“县对县，一百欠”讲的是这个县城到那个县城距离，凤阳到定远，不到一百里路远。我当时只有五六岁，开始走还可以 小孩也不懂得什么 口里喊着“要饭去啦 要饭去啦！”又是跳又是跑，开心得很。到了下午，太阳快要下山了，我的脚跑肿了，脚面子肿得像个馒头。我父亲、母亲看了心疼得要命，再不叫我走了，我妈妈挑着担子，我父亲背着我，天都黑了好大一阵子，我们才到了定远县城。记得我们住的是很大的一个房子，叫红寺。这样大的房子我还是头一次见，里边有四根大的木头顶着屋顶，说叫四大明柱，里面住了很多人，找一块地方，地上铺上草，一家人挤在草上睡觉。我大娘家、南营里我哑巴大娘家、韩德藻的母亲也是我喊大娘一家子，我外公外婆和我老舅他们也住在里边。同时住在红寺里边的有不少人不认识。

红寺的门口有一个水池子，是砖砌起来的，里边水不多了，却有几个大炸弹，听说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投下来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未爆炸。我们一群孩子站在边上看，大人把我训了一顿，我外公说：“炸弹有什么好看的，快走开，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你们跑都跑不了，快离开到别的地方玩去。”从那次我们再没有敢到池边上去玩，害怕炸弹真的爆炸了，来不及跑可真玩儿完啦。

要饭在定远住了一个多月，有的人在家呆的时间长些，因为要春种了，男人都回去种地了，有的把女的和小孩子留下来继续在那里要饭。那时淮河边的人都刚跑反不久，都不富。好像定远县比我家里好些，但要饭也很难要，哪家有多余的呢？这次要饭我没有出去过，爸爸妈妈就我这一个儿子，舍不得，怕我叫狗咬着。哪家看家的狗对要饭的都不客气，凶得很。有一天，我妈和大娘，还有我哑巴大娘，她们一起去要饭，到了一个庄子上，有好几条狗出来咬，我哑巴大娘没有看见，十个哑巴九个聋，她又听不见，结果叫狗给咬了，裤子被撕破了，人也摔倒了，碗也打了，这时我才知道要饭真难呐！……

凤阳县地处淮河的南岸，西边是寿县。寿县曾是楚国的国都，陈胜、吴广起义的地点离那里不远，那里地势低洼，几乎是年年被水淹。安徽省西部接河南。河南省的地势比安徽寿县这个地方高得多，每年秋天雨季到来的时候，只要雨稍大些，河南那里的水就从淮河流下来，水往低处流嘛，我们凤阳县靠安徽省的东北部，叫皖东北地区，五河县的东边就是江苏。江苏的地势虽比安徽省低，但比河南到安徽要平缓的多，从河上游下来的水很快，但从江苏省出去的水，流得很慢，就在寿县这个地区形成水涝，雨愈大积的水愈多，安徽内涝的范围也就愈大，到了把整个寿县淹光的时候，波及的地方也就更大了。凤阳县沿淮河的地区都遭受过水淹，临淮关是凤阳县的第一大镇，水大时淹到了门头顶上，窗子在哪也看不见了，有的地方房子甚至没了顶。水一淹庄稼是颗粒不收，可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政府，照样是苛捐杂税，人们拿什么交呀，不少人家不等秋收就拖儿带女地走了，因为无秋可收啊。

我们韩家庄处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我们把淮河边上的地方叫湾里，湾里人把我们那里叫岗上，水从来就没有淹到过岗上。雨水多了水稻就能收一些，雨水少了，只要不是根本无雨，旱庄稼如高粱、豆子、地瓜、玉米等总是可以收一些。但因为岗上的土地贫瘠，收打的粮食很少，每亩水稻二三百斤，小麦一百多斤，豆子只有几十斤，少的只有十几斤。在我的记忆里，哪年颗粒不收的也没有过；水田的稻子，旱地里的庄稼都丰收的年景，也没有过。这就形成了年年有收成，年年有灾荒。每年秋收后，交完了苛捐杂税，剩下的粮食就不多了。我家在我们庄子上不是最差的，刚称得上是中下吧，估计有十五六亩地，水田比旱地稍微多点。家有六口人，我父亲、母亲，三个妹妹送给我舅舅家一个，我姐姐出嫁后，还有我弟弟和我。我们那里农忙时一天三餐，两干一稀，农闲时每天是两稀一干，也有时是一天三稀。下雨下雪出不了门时，就一天两顿地瓜稀饭。从头年收完地里庄稼到第二年接上早熟的麦子，要六至七个月的时间。俗话说，大口小口一个月一斗（每斗二十三斤），这样我们家每月要五斗多口粮，农忙时要六斗或更多些才能过得去。我们庄子有的人家土地没有这么多，人不比我家少，有的家根本就没有土地，靠种地主的土地，哪里弄那么多的粮食，吃不到第二年春上就揭不

开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本不管是水涝，还是旱灾，只管收他的苛捐杂税，从不治理淮河，也不搞水利，任洪水泛滥，任你靠天吃饭。因为水旱造成的灾害，从我记事时起，年年如此，官府又不管，除去拖儿带女去要饭，还有什么路可走啊！

1946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那里有过新四军的游击队，经常人来人去。青纱帐起来时过来的多些，地里的高粱、玉米收割了以后就来的少些。一般的就二三十人，没有统一的服装，穿的长短不一，颜色各异。除没有穿红衣服的以外，白的、黑的、灰的，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可真是地道的游击队。有一挺机枪，我叫不出名字，长枪除去有几杆“中正式”外，就是“汉阳造”老套筒子，有的还没有枪，就是一把大刀，刀柄上系一块红布。游击队的人特别好，说话和气，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哪个人对老百姓发过火。对我们这些孩子更是又说又笑，经常住在我家和我大娘家过道里的一个干部，他姓冯，都叫他副排长。他背的是一支短枪，他对我特别好，经常来又常住在我家，我们熟悉了，他就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有时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知道我家里穷，他们吃饭时，有时把饭拨一些给我吃。我也很喜欢他和游击队的同志，因为他们待我们像自己家人一样。我真想跟他们去当游击队。

有天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冯副排长在他睡觉的门板上整理东西，看样子又要出去了。因为经常是这样的，上半夜出去，下半夜、天亮以前回来。我凑过去，小声地说：“副排长，我跟你们当兵去行吗？”因为怕我父亲母亲知道，不敢大声说，冯副排长转过脸来，非常和气地说：“好啊，宝子（我的小名）欢迎你！”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又说：“宝子，你想跟我们当兵很好，不过现在不行，你年纪太小，待你长大了，一定欢迎你到我们部队里来。”我说：“我能跑得动，什么都不怕，让我跟你们去吧！”他说：“你别急，待你长大了，我一定来带你到我们部队去当兵。”我再争也没有用，当时我确实有些小，只有十二三岁。我喜欢他们，佩服他们的勇敢、不怕死，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很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我看到他们同大溪河的二鬼子打过一仗，他们不怕死的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碰在一起的，怎么

打起来的，打仗的地方离我家最远不到两里路，最近只有半里多路。二鬼子有四五十人。从表面看，他们的服装、武器都比新四军游击队好，人数也比新四军游击队多。当时新四军游击队也就二十人左右，可他们把四五十人的二鬼子打得直跑，也没有放多少枪，就把二鬼子从我家西南面七里庙子，一直赶到大溪河的西头子，赶了六里多路。真是好样的。用我们家的土话说，乖乖，真有种。驻在大溪河、小溪河的鬼子，多的时候有百把人，他们虽然把新四军游击队叫土八路，可他们照样怕游击队。他们不敢随便出来，不敢随意离开大溪河、小溪河的炮楼。他们出来扫荡，都是叫二鬼子走在前面为他们挡枪子儿。日本鬼子的服装好，黄衣服，小帽子，穿大皮鞋，走起路来咔咔的，神气得很。武器装备比新四军游击队可好多了，小队长挎着大洋刀，背着王八盒子，胸前挂着望远镜，其他鬼子全是三八大盖，明晃晃的，还有一具掷弹筒，真够吓人的，但是他们照样怕被他们叫做土八路的新四军游击队，他们照样打不过新四军游击队。

有一次日本鬼子到花园湖东石门山去扫荡，大溪河、小溪河的鬼子，除去留下看家的都集中去了，据说有五六十人，还有大溪河、小溪河的二鬼子百把人也集中起来去了，看样子好像要大干一场。鬼子叫二鬼子走在前面为他们开路，二鬼子他们知道新四军的厉害，但又不听日本鬼子的，只好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向石门山开去。新四军游击队可不是好惹的，得到日本鬼子要进山扫荡的情报，早就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在靠近石门山的前面布下了伏击圈，等着日本鬼子扫荡部队前来。这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日本鬼子的扫荡队到了新四军游击队伏击圈。二鬼子走在前面，新四军的游击队根本就没有管他，把二鬼子放了过去。当日本鬼子进了伏击圈，新四军突然开了火，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日本鬼子打去。二鬼子听到枪响，撒开丫子跑了起来，顾不了日本鬼子啦。日本鬼子受到了突然的袭击，一下给打懵了，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呢，就被新四军游击队撂倒了几个。待清醒过来，新四军游击队已撤出了战斗，不知去向了。日本鬼子又打了一阵子枪，因找不到新四军的影子，只好抬着死的，挟着伤的回来啦。

第二天，日本鬼子在大溪河街后，牛市的西北边四五百米的地方架

起了一堆木头，把被打死的两个日本鬼子放到上面，浇上汽油，点火烧了。这天大溪河正好逢集。我记得那时大溪河是一、四、七、九逢集，十天四个集。上街的人都到后面去看，我也挤在人群里看，不过烧人的地方，四周日本鬼子站上了岗，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向着围观的群众。人们只好远远地看着，不敢靠近。有的在小声说话，听不清是在说些什么，但从人们的表情上看得出，他们是在说：“烧吧，烧吧，把日本鬼子统统地烧死才好呢！看你们还敢不敢下乡扫荡，再敢下来扫荡，让新四军游击队把你们这些害人的日本鬼子全部打死，那才大快人心呢！”

有一次，新四军游击队在夜晚到了大溪河街上，就去了十几位同志。冯副排长学着北方人说话腔调，手拿纸筒子对着上头的炮楼说：“我们是老八路，有事要到大溪河街上去，大部队要从这里过，你二鬼子要仔细地听着，不准你们乱动，要老老实实地呆在炮楼里，否则马上就把炮楼给你端了。”二鬼子吓得屁滚尿流，老老实实的，动也不敢动一动。冯副排长回来给我们一说，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有次也是大溪河逢集，那天天气很冷，吹着西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刺人的脸。大溪河牛市靠东边的小水塘已被冻得结结实实，我们一群孩子在冰上滑来滑去，玩的很热闹。我外爹爹在牛行当行用，就是在买卖两家中间帮忙讲价钱，如能做成买卖可从中拿点行用钱花。我外爹爹对我特别好，我们小孩子一起到大溪河街上去玩时，我总是要去看我外爹爹。有时到中午了，外爹爹拉着我到路边的小饭铺子吃碗面条。他街上的事办完了，有时我们也一道回家。那时我外爹爹家住在梅家，种人家的地。我外爹爹的老家是寇家庄，他家的地很少，除去我大舅和大舅母有时在寇家庄外，全都搬到梅家来了。梅家离大溪河，比我们韩家庄要近里把路，我回家也很顺路，从我外爹爹家门前过来就一直到我家，也不用翻山，不用过岗，站在屋后头看我家很清楚。我外爹爹很喜欢我，关心我。他看我们在水塘里的冰上来来去去地滑，怕我们把冰踩裂了，掉到水里去，就喊：“小宝子，快过来，别掉下去。”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哪里肯上去呢？我说了声：“冰很厚，不会的。”照样玩下去。怕冷的年纪大些的人，都靠在牛市东南面一个小土堆子旁避风，晒太阳。突

然一声枪响，是从东面传来的，大溪河街紧靠从花园湖到小溪河东铁路大桥的那条河。枪是从河东打来的，也不知道谁叫了声：“新四军来啦！”这下子可开了锅，我们一群小孩玩得正在兴头上，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大溪河街的日本鬼子、二鬼子吓得像龟孙子一样，拼命地夺路向炮楼里蹿。论人数鬼子、二鬼子加起来要比新四军游击队多，论武器他们要比新四军游击队强。我们从未见过新四军游击队有什么炮，也没有掷弹筒。但他们怕新四军游击队，怕得要命，真可谓是闻风丧胆。我们家乡老百姓有这样的话，说日本鬼子、二鬼子都是些孬种，怕死鬼，他们就是能欺压老百姓，只要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来了，他们就变成了孙子。

就在那几年，我们庄上请沈二先生在韩万玉家的北厢房办了个私塾学馆。四周的几个村子，管家庄、梅家庄、毛家庄、狄家庄和我们庄子上有二十多个孩子跟他念书。学生的年纪不等，大的十七八，小的十多岁，我是比较小的一个，学的东西，读的书也不一样。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还有其他的书。沈二先生根据学生的年纪大小，接受能力强弱规定念什么书。我是从《三字经》开始念的，就是背书。我就念了一年，还未开讲，就改念教科书了。念教科书，沈二先生叫我从第三册开始。第一册开头是“人手足刀尺”，第二册的头一课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可能是“来来来，大家来上学”。沈二先生认为太简单，他叫我从第三册开始。第三册的第一课是“燕子，你又来啦……”共八册的教科书不到半年也就念完了。也学写字，就是沈二先生写好的字，在上面蒙上一层纸，我们照着先生写的描，也叫写仿。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写字，手腕写痛了也写不好，很着急。先生看了很不满意。也可能与我性子急有关系。我的脑子不错，记忆力很强，背书背的比一般同学快。有的同学一天背一课，我一天大多是背两课，多的时候背三课，像是闹着玩儿一样。老师沈二先生要求是很严格的，如果读书、写字两样都不好，那是非挨打不可的。我因为背书背的好，沈二先生很喜欢，所以没有因为学习不好挨过先生打。

我也挨过先生打，打了三戒尺，不过那不是因念书写字，现在想起来还好笑。有一天午饭后，我们学生都到了学堂。天气很热，大家没心

思背书写字，都在东拉葫芦西拉瓢地叫唤，有的甚至坐在了桌子上。俗话说先生不在家，学生上屋爬，闹的不像样子。有个学生叫小朱子，大名叫做什么我记不得了，他是我二伯父后续的老婆带来的，可能比我小一岁，个子也比我小，坐在我前面一排。不知怎么闹出了圈，玩起了捉屁给人家吃的把戏。就是把手放到屁股后边，使劲放屁，屁响后用手抓住，往别人的鼻子那儿放，叫别人闻他的臭屁。有次他可能肚子不好，一用劲放屁，结果把稀屎拉了出来，弄了一手一地的大便，两间屋大小的学堂臭得要命，同学们都捂着鼻子往外跑。

正这时候，先生进了学堂，看到这种情况能不生气吗？脸都气青啦，回头出了学堂，又把学生叫了出去，让大学长和值日生去打扫。打扫完了，又把桌子板凳整理好才叫同学们都进去。同学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沈二先生气呼呼地坐下来，把戒尺拿过来放到他的右边。戒尺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小的有半尺多长，也不宽，是学生在上课中间，请假外出解手用的。哪个学生要解手，到先生面前，先鞠躬，报告先生，先生许可就把那个小的戒尺拿给你，回来再报告先生，把戒尺还给先生。每次只能出去一个人，怕两个人出去打闹玩耍，像个请假条。前面一个人没有回来，后边的人就是尿了裤子，也出不去。大的戒尺有一尺半多长，两三厘米宽，一厘米半左右厚，那是用来惩戒学生，打手心用的。谁违反了先生的规定，或学习不好，谁的手心就要挨戒尺。

今天沈二先生真火了，从大学长开始，往下轮，每人三戒尺。我坐第二排，看着一个一个地挨打，心里也紧张。每个学生走到先生桌前，先给先生行个鞠躬礼，把右手伸过去，先生用左手抓住学生的右手指，右手高高地举起戒尺，重重地打在学生的手心上，还不准叫，不准动，更不准往回缩手，否则再重打三戒尺。有个学生挨打时，骂了先生，被罚到院子里下跪晒太阳，先生不叫，不准回来。轮到我了，我走到先生面前，先给先生行了礼，站好了，伸出右手，闭上眼睛，等着挨打。先生照样打了我三下，我忍住了，是有些痛，但能忍受，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小，除了小朱子，数我小了，加上我的态度还算好，先生手下留情啦。折腾了一下午，也未上课，就放学回家了。

我家虽穷，但我从生下来还从未挨过打。那时我弟弟还未出生，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哪儿舍得打我，碰也舍不得碰一下，挨打，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到家里也不能说。怕父母知道了心疼。不过那次挨打是人人有份，再说我也不冤，在学馆里胡闹，捉屁给别人闻，我也参加了，还有什么好说呢？在学校里先生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不能过问，因为在开学的那天，家长就把孩子领到学馆，让孩子跪在先生面前，说我把孩子交给您啦，望您严加管教，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一切任凭先生，家长决不干预。如果因为孩子挨打，家长不满去找先生，万一先生不高兴，说你的孩子我管不了，以后就不要来啦，那孩子不但书念不成了，学费还得照交。开学立的规矩是先生不教分文不要，学生不念分文不欠，你不念了，学费还得交。虽说学费就是一百多斤大米，可对穷人家来说也不容易，只能念下去。

当然，穷人念书，并不是要念到多么高的程度，只是希望认识几个字，不当睁眼瞎而已。我只念了一年，不为别的，确实念不起了。农民的孩子年纪虽说不大，也是个小劳动力，也能给父亲帮把手。这一年的学馆生活，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有益的，虽说在劳动中还给了老师不少，但毕竟是打下了个基础，参军到部队后，学文化进步的比较快，还不到一年，在我入团时，指导员李勇给我的鉴定是能认识 1500 个字 要不然后来的飞行员也是当不成的。因此在我的内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沈二先生的教导之恩。沈二先生早已去世了，我将永远地怀念他。

我从小就喜欢听人讲故事，真可以说到了入迷的程度。我们庄南营里有一个姓丁的老头，家里很穷，是韩万玉家的一个亲戚，我们都叫他丁二爷。他孤身一人，没有子女，无房无地，住在沈先生家的破房子里，自己劳动自己吃。他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他。每到地里庄稼收完了，我几乎每晚都到他住的破房子里，听他讲故事，或唱我们农村的一种民间小戏，叫做“花鼓灯”。冬天春节前后，十几个人汇到一块，锣鼓一敲，就在打谷场上唱起来，也没有什么道具，都是男人，如唱女的就用毛巾把头一扎唱起来，也说不上什么好与不好，完全是自得其乐吧，有时也围上几十个观众，经常弄得人们哈哈大笑，蛮有意思的。我还学过几段，可惜忘记了。

我们那里比较叫好的戏种叫做“泗洲戏”，也叫拉胡腔、肘股子，都是一样的戏，只是叫法不同。有服装、有伴奏、有道具，在我们那里算是大戏了，在打谷场上，打开一个场子，要开戏了，拿个锣到村外边一敲，周围村庄的人就散散淡淡地来了，人多时能有一二百观众，有时也搭个台子演戏。这样来的人更多，千把人都有。唱的戏大多是《朱春登赶考》、《金秀英下山》。现在想起来，内容还是比较健康的。我非常喜欢，对唱戏也很敏感，听一次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回家来就能唱出来。因为我的嗓子好，唱起来大人们也喜欢听，没有不称赞的。父亲高兴时，常说：“宝子，唱一段听听。”有个家门中的亲戚，也算是长辈，我叫他舅舅。他说：“宝子，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去学戏吧！”我真想去，后来叫我二伯父知道啦，把我训了一顿，说什么不学好，七十二行，什么都能学，就是不能学唱戏，整天扭扭捏捏的，是一种下流的东西，将来死了都不能进老莹。还说当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老人的教训，我也不能违背，只好打消了学唱戏的念头。

朱元璋的故事，我们那里的老人都会说上几段。我知道的朱元璋的故事，都是从丁二爷那里听来的，是真是假不知道，都是一些传说，但我相信。所以，那时听丁二爷讲朱元璋的故事特别认真，总怕什么地方丢掉了，有时听到深夜，从来不让别人打扰。从那时到现在有五十多年了，可那些故事仍记忆犹新。

我记得丁二爷说，朱元璋家里很穷，从小就要饭，稍长大一点就帮着富人家放牛，童年就受尽了苦难。朱元璋十多岁的时候，在离我们家韩家庄有十多里路的金家小山子帮富人家放牛，天天是早出晚归。朱元璋的年纪虽小，但个子很大，头上长了一头的秃疮，又没有衣服穿，很是可怜。朱元璋很能吃饭，他的饭量特别大，一顿能吃七八碗干饭，还能喝半水桶稀饭，可是老板根本不给他吃饱，他只有饿着肚子给富人家放牛。有一天老百姓在金家小山西南边要打一水坝，留着蓄水用，去了很多人，从早上干到中午也没有打多高，到了中午，打坝的人要回家吃饭的时候，朱元璋对他们说，你们给我带些饭来吃，中午我给你们把水坝打起来。打坝的人怎么会相信呢？说小秃孩子吹牛，你要是能把水坝打起来，我们管你吃饱。说着说着，人都走光了。未来的皇帝，金口

玉言，有各路神仙保佑，待人都走完了，朱元璋一中午把一条又宽又长的水坝，高高地打了起来。等到下午吃过饭的人回来一看，水坝真的打起来啦，一个个傻了眼。原先说的管你吃饱，只是一句玩笑话，谁也不相信朱元璋一中午真的能把一座大水坝打起来，所以谁也未给朱元璋带吃的来。这下子朱元璋火啦，生气啦，往坝埂上一坐，搓开了泥条子，搓了就往坝埂放，短的变成了泥鳅，长的变成了黄鳝，都钻到坝埂里面去了，到处都钻成洞，坝儿有水就往外漏，坝埂漏水怎么堵也堵不住，这就是朱元璋使的坏。朱元璋饿得没有办法，实在是受不了啦，就把他放的牛杀了一条，在金家小山子上面挖了一个坑，把牛弄到里面，割来山上的草，点着烧，一顿把一条牛给吃光了，又把牛尾巴塞到悬崖上的石头缝里，往外一拉，牛还哞哞地叫。天黑后，朱元璋赶着牛回到家里，老板问他牛怎么少了一条，他说牛钻到悬崖上石头缝里去了，怎么也拉不出来，使劲拉，牛还哞哞地直叫唤。老板哪里肯信呢，叫他领着去看。朱元璋领着老板一同到牛钻石头缝的地方一看，果然像他讲的一样，老板双手拉着牛的尾巴，牛在石头缝里边哞哞地叫，怎么也拉不出来，也只好算啦。老板气得把朱元璋辞了，不要他放牛了，把他撵了出来。朱元璋又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没有办法，就去当兵了，在郭子宜的部下当兵，据说是骑金马走的。在花园湖东岸有一个孤山，名叫小团山子，那山里面是金马住的地方，金马成群结队，经常出来到花园湖里喝水，个个都是膘满肉肥，叫起来震得花园水乱颠，跑起来是四蹄生风，日行千里。那马力大无比，朱元璋骑着金马去打仗，总是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任何敌人也抵挡不住，仗仗都打胜，没有不佩服的。因此和朱元璋一起的兄弟们都推举他为头，消灭了元朝，建立大明朝，最后当了皇帝。

还有很多传说，丁二爷全都知道，他常给我们讲，我们一群孩子没有不喜欢听的，也有的大人对我们说，别听他胡扯，可是我们这些孩子确实信以为真，我是毫不怀疑的。我还去找过朱元璋煮牛吃的地方，只是在山顶上的西南角，有一块不大的洼地，我想那可能就是朱元璋煮牛吃的锅吧。金家小山子，顾名思义，是一个小的山，说大一点，也就几十米高，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悬崖石壁，当然也就没有石头缝能让牛钻进去。

的。反正是传说，你信也可，不信也罢。

凤阳人唱出名的是“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出了皇帝，不但不夸耀，反而把对朱元璋的不满，编成歌到处唱是为什么呢？我听老人们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朱元璋当了皇帝在凤阳建了中都城，朱元璋要坐凤阳。凤阳皇城范围很大，城分三道，外城为土城，周长 33.6 里，城墙的宽度可容两辆大车对开。二道城为砖城，周长 7.5 里。三道城即是内城，周长 755 尺，高两丈，建设得非常豪华。城墙下面是玉石雕刻的各种图案，每块玉雕都是一幅杰出的画面，上朝下朝所走的道路也都是玉石铺起来的，豪华极了。城堡范围之大，建设之豪华在全国独一无二。朱元璋为他父母修的皇陵规模也很大，占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把城内的群众统统都赶走了，用的钱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老百姓对朱元璋能不怨恨吗？中都城即将完工时，朱元璋带着文武大臣，三宫六院，大小官员好几百人，车水马龙，浩浩荡荡地到了中都城，过去和朱元璋一起帮过工、讨过饭的一些穷兄弟们，推选了几个人当代表，去跟朱元璋讲理，说你当了皇帝不仅把我们这些穷兄弟都忘了，而且霸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把我们都赶走，叫我们无家可归，要朱元璋给个公道。朱元璋一听火冒三丈，说我一回来你们不但不欢迎，反而带头闹事，这还了得吗？于是叫他的手下，把去找他讨公道的人全给杀了。

说来也怪，这一夜朱元璋怎么也睡不着觉，翻过来，覆过去，一闭上眼睛，被他杀了的穷哥们儿，一个个鲜血淋漓的，手里捧着自己的头，向朱元璋讨还性命，吓得他一夜未合眼，想来想去，凤阳这个地方不能呆了，我一回来就杀了人，而且被杀的人都是熟人，都是过去一起受苦的穷哥们儿，他们能饶得过我吗？我这个皇帝在凤阳还能坐的稳吗？吓得朱元璋第二天就回了南京，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回凤阳去过。

中都城的规模、皇陵的规模和豪华程度，现在只能靠想象来完善它了，除去紫禁城下端的玉雕，皇陵的石雕和文武官员的石碑等遗迹随处可见外，其他的已经毁坏。据老人们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打破凤阳城以后点起了大火，把一个建筑规模宏大的中都城全部烧光了，据说大火整整烧了两个多月，可想而知凤阳中都城的规模之大。前些年我们

国家著名史学家翦伯赞通过考察，把凤阳城、南京城、北京城做了个比较，就其规模、豪华程度来说，凤阳城是老子，南京城是儿子，北京城是孙子，可见凤阳建筑规模宏大和豪华程度。修建这座城霸占的土地之多，挥霍的财力、物力之大是难以计算的，激起人民的反对那是很自然的。一座皇城造成了千百万人民无家可归，拖儿带女，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这才是“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老汉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溜四方”的实质。凤阳人不是爱逃荒，爱拖儿带女背井离乡去要饭，而是被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啊！更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凤阳人爱要饭，有要饭的习惯。家下有锅粮，谁会去逃荒呢？从流传很广的这首民谣里可以充分地体现出凤阳人民热爱自己的家乡，爱憎分明，是勤劳勇敢的英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别人能办到的事情，凤阳人也一定能办到。

## 我 的 一 家

我的亲爷爷亲奶奶我没有见过，他们是什么样的，当然是无从知晓。

我的爷爷有三个儿子，我爸爸是老三，我大伯父去世的很早，那时还没有我。我二伯父是过继给我四爹爹的，我四奶奶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我家和我大伯母家住在一个门道里，共有六间房子，我们两家各三间。我大伯父家住后三间，我家住前三间，大伯母家进出都从我家锅台边过。后来大伯母家在门前靠北一点又建了两间门朝南的房子，都叫它西屋，我四哥韩德兰就住在里边。

我记事时，我家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到 1949 年我参军时中间人口有变化，比我大八岁的姐姐，在我八岁时嫁给了离我家有七八里路的车家庄上姓胡的，我姐夫叫胡家朋。我妈妈又生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我第二个妹妹，送给我大舅家了，因为我大舅家没有孩子。我的二妹妹长得胖胖的，很好玩。我大舅母接她

去的那天，我二妹妹拼命地哭，不愿去。哭的太厉害了，我的心都动了，我问我妈不送不行吗？当时我二妹妹人不到两岁。回想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送给亲娘舅家的，他家没有小孩，不会亏待她；另一方面我家穷，送出去一口就少一个人吃饭，也是出于无奈。我离家时，还有一个比我小八岁的小妹妹和比我小十二岁的弟弟，共六口人。按劳动力算是三个，虽有十五六亩地，生活也很艰难。

我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劳动是把好手，播粮撒种，捆草扬场无一不精，但年年收的粮食仍吃不到夏季。农闲时我爸到淮河边挑鱼、挑盐，去定远县那里卖，以弥补生活上的不足。从我家到定远县要经过铁路，日本鬼子投降以前，鬼子把得很严，铁路上经常有查道车来回地跑，要叫他们抓走，说你贩私盐，勾结八路，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

在定远东部的山区，罗炳辉领导的新四军经常在那里活动，他们是正规部队。日本鬼子叫他们老八路。日本鬼子封锁铁路，不准铁路北边的物资往铁路南边运。不管你贩运的是什么，叫日本鬼子抓到了全部没收，给你加上一个私通八路的罪名，活人也把你打死，还有的被捆在电线杆子上，叫狼狗咬，用刺刀挑。日本鬼子惨无人道，他们根本不是人。因此挑东西到定远那里去卖是很危险的，可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爸爸也只好去冒风险。白天根本不能走，月亮天也不敢走，都是事先约好几个人，在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下半夜，挑着挑子，非常小心地，偷偷地翻过铁路。

有一次，我爸爸他们刚过铁路，日本鬼子的查道车从西往东开了过来。车上的大灯亮着白光，转着圈子照。我爸爸他们又舍不得把东西丢掉，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拼命地跑。结果是跑出来啦，但脚给扭坏啦，回家来躺了半个月，还落下残疾。很长时间，一遇上天阴下雨就痛得不好走路。种田人都知道，农时是误不得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哪。尤其是插秧季节，我爸不得不带着病到水田里劳动。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干的活我还不能担当起来。如在水田里，耕田、耙地、挑秧把子这些重活还得他干。我妈妈心疼，不让爸爸挑，她自己挑。我爸爸是我家的顶梁柱，我们都爱他，尊敬他，心疼他，他为我们这六口之家尽了他的全力，我们永远地感激他老人家。他在旧社会受坏的风气